

媒介与学术

MEIJIE YU XUESHU

——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视角

YI 20 SHIJI ERSANSHI NIANDAI

WEI SHIJIAO

李春雷 任慧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媒介与学术

——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视角

李春雷 任慧/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与学术: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视角/李春雷,
任慧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5

ISBN 978 - 7 - 80696 - 388 - 3

I . 媒... II . ①李...②任... III . 传播媒介—影响
—学术思想—中国—民国 IV . G219.296 B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6654 号

媒介与学术

——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视角

李春雷 任慧/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市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85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 - 7 - 80696 - 388 - 3

定 价:20.00 元

前言

现代意义上的媒介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即包括了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形式的介质。事实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中国的广播已经出现,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创阶段,如下图: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广播发展一览表

时间	地点	创办人或发起人	发射功率	播出内容或倾向	备注
1923	上海	E. G. Osborn		音乐和《大陆报》上的新闻	
1924	上海	开洛公司	100 瓦	报告相关的一些新闻	该台与《申报》、《晚报》合作,呼号为 KRC
1927	天津	北洋政府交通部	500 瓦		由天津无线电报局建立,呼号为 COTN
1927	北京	北洋政府交通部	100 瓦		呼号为 COPK

① 根据陆晔、赵民主编的《当代广播电视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9 页整理而成。

续表

时间	地点	创办人或发起人	发射功率	播出内容或倾向	备注
1928	南京	国民党中央	500 瓦	播出国民党中央一切重要决议、宣传大纲以及通令、通告	呼号为 XKM 后改为 XGZ
1932	南京	国民党中央	75 千瓦	宣传国民党中央的相关讯息	呼号为 XGOA
1936	南京		500 瓦		是短波电台,呼号为 XGOX
1938	汉口		250 瓦		短波电台
1938	重庆		35 千瓦		是短波电台,定向北美各国呼号为 XGOX,定向欧亚各国的呼号为 XGOY

由上表不难看出,其时由于技术层面的限制,广播这种形式很难达到预期的覆盖面,而且播出设备难以普及,更重要的是播出内容鲜有涉及学术,加之当时的电视还未在中国出现,因此,此处论及的媒介主要指书籍、报纸和刊物。^①

① 事实上,对于何为“媒介”,学界也有过不同的讨论,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述,本书采用了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即“媒介”是大众传媒的一种简称,这种提法不仅符合了时下一些较为流行的论点,更重要的是,对于笔者很好的凝练出本书的中心意旨也大有裨益。但是,涉及具体此问题的讨论,不仅学界有不同的声音,就是笔者本人亦认为,“媒介”如果还原到英语的“media”的话,那么它应该涵指一些特殊的机构,如通讯社等等,特殊的一些群体也应有所包容,本书中几次把“留学生”作为论述的重点,既有笔者学科背景的因素,又包容了笔者上述的一孔之见。

反观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历程,可谓与媒介相伴而生。不要提林则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对守旧者起到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单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而言,媒介实际上就担当了助产婆。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刊、出版的空前活跃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所谓的平台有两层含义,一者媒介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成为这一时期学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凭依,凝聚学术共同体也因之是其功效之一;再者,民国时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学术风气、学人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媒介的传播活动息息相关。从另一角度而言,学人和学界对媒介的认识和认同亦是论述本主题需要考量的因素。

事实上,笔者一向固执地以为,学术的初衷或曰其最初,由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而设,因此,其本初意义就是完整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随着学术的逐渐发展和健全,学术中的单项学科越来越多,“体制”也益趋“完善”,学人似乎对其真正目的淡忘了,对终极价值的理解发生了倾斜,德国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家西梅尔(Georg Simmel)认为这是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学术的发展只是增强了认清问题的手段,但现在手段本身似乎就是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这也是国人与学术疏远的真正原因所在。虽然明显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既名之为学术研究,其自身的律例还是该有的,因此成文时笔者仍遵循了学术的规范。在研习新闻传播的诸君眼中或许觉得太过书卷气;而在文史哲学人来说,无章节体且形散的成书格局又过于随意。好在笔者初始并无彰显或闻达的设想,更无奢望能传之久远,但自信学术之于研究者的学术耐心和学术公心却是长存于心的,基于这一份学术的自律和学术的良知,本书多多获取一手资料并以其相佐证,且未被资料

所压迫,而是从独立成文的角度在此议题下游走,如果能从几个侧面或角度对所提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和尝试性的探索,以沉思引发共鸣,则是书将不辱使命。因为围绕这个框架所产生的种种难点,近年来也同样困扰着大陆的学人,如对近代以来媒介的“立场”问题及其所关涉的中学西学孰优孰劣问题,就不独笔者所苦苦追索。同时,对先行者的探究空泛地表态或盲目的追随亦超出笔者所愿,因此该书没有也不可能以卷帙浩繁来求“全面”。惟其如此,笔者不惮笔力之拙,在此先为读者方家列陈点滴思考,以期能对全书起到引领和阐释的功效。

现象一 学术的回溯:政治与介质的“皮毛”关系

古时的士子多以道自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以修己身之“道”来改变天下,故孔孟皆周游列国,处处宣讲自己的学说,谓之“布道”。时至战国中期,一方面战国群雄争霸,诸侯国战乱不已;另一方面内思安定以强大,对“道”及其载体士也是纷争不已。正如荀子所言:“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①虽然当时并没有统一的封建王朝,但事实上群雄恰是为了寻求一统华夏的“良方”而把士笼络在自己的护翼之下,士的竹帛著书以扬道似乎有机会寻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士的地位也高到了一个极致,结果在思想学术上则出现了少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秦始皇的大一统不仅迎来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传播的春天,而且还经历了“焚书坑儒”的严冬。随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毫无疑问借助了政治的权威,以“五经博士”控制了

^① 《荀子·君道》。

候补文官的教育和考试等权,由孔子编订和整理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传本就被官方定为了教科书,而且“经”的概念不再仅指儒家学派尊崇的所谓孔子亲授的五类或六类经书的专称,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赋予了纲领性学说或文献的意义。经学的这种传播范式古代学者也有认识,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就说“古者,诗书礼乐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艺,以为经籍之首”^①。此处提到的“诗书礼乐”显然包括在传统的“经”的范畴里,“垂世立教”的社会功用已表明了它在传播之始就具有的特殊地位。马端临对“班史著之六艺,以为经籍之首”的论述也没有言过其实,因为《汉书·艺文志》就记载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需而备,而《易》为之源原”。相较而言,诸子“各推所长,穷之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诗赋“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等等^②,虽然传播内通以“经”为中心,但其本身及其载体的传播介质在这里似乎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发言权”。

介质的这种情形在整个封建社会并无多大变化,至少到明朝前期还是这样。因为像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纂,也还是经过宋神宗“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③的首背后进行的。期间的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陆九渊两家曾相会于信州的鹅

① 马端临:《经籍考》“经部乐类”。《文献通考》卷186,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89页。

② 《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3、1764、1756页。

③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湖寺,各自阐发自己的观点,相互攻击。朱熹主张通过“泛观博览”启迪人们内心去遵循“天理”;陆九渊则提出先使人“明本心”,再使其“博览”。这场“鹅湖之会”为学界所熟知,也似乎为学者“自由论辩的风气存焉”提供了论证,但这种论辩,不要说传播范围不足以成为“大众”传播,就其实质而言,两派学说虽有自由阐发的空间,但其终极价值还是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明前期的王阳明随后继承发扬了陆九渊的学说而独树一帜,但充其量是封建统治理论的另一替代品,因此皆未脱离笔者所论的依附关系。

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①,如果忽略其内涵所指,单从字面意义来说,实际上反倒强调了“毛”与“皮”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前述虽然简略,但政治与介质的“皮毛”关系不言自明。

现象二 西学与中学的激荡:媒介的双重身份

不管怎样说,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唤起了西方商人新的追求,也无疑为作为当时西方社会知识精英的传教士开拓了空间。《马可波罗游记》所透显的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的气息也因之在西方社会泛起了阵阵涟漪。这事实上为又一次大的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这次文化交流的“候鸟”便是传教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也曾利用传单小报宣传自己的教义,但限于当时条件并未借助近代意义上的出版,因此所传范围也有相当的局限。从1815年到1842年,外人在南阳与中国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

^① 《左传》僖公十四年。

刊。^①事实上,到了1834年,以英美传教士为主所组成的“中国益智会”便开始成规模地介绍了许多西方历史、地理知识,在4年多的时间里用中文编印的有关世界史、英国史、犹太史和美国史等方面的著述不仅数量多而且效果明显。在早期编译方面传教士贡献最为突出,如英国艾约瑟编译的《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等书就颇有影响。英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和学会也曾经发挥过先导作用,例如《万国公报》是晚清在华人士,主要是西方传教士所主办的中文报刊,曾对中国近代学术和政治的发展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87年11月1日由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创办。“在19世纪90年代,《万国公报》和广学会的出版物,曾经是晚清学者文人认识世界的媒介,特别是了解近代西方世界的媒介”“早在1917年俄国军舰阿芙乐尔号炮打沙皇冬官前18年,马克思学说便已介绍入中国了,介绍文字见于1899年的《万国公报》,而介绍者便是李提摩太及其中文助手蔡尔康”^②。

可以说,传教士充分意识到了报刊的作用,办报很有成效的李提摩太就曾经提到:“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的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因此,有效地控制住中国的主要报纸与杂志与“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没有什么两样^③。大致说来,除早期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② 分别见朱维铮:《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③ 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南的信》。转见于《中国近代报刊史》,第19页。

传》、《广州纪闻报》外，外人在 19 世纪下半叶创办的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香港中外新报》、《中外杂志》、《益闻录》、《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新报》）等 20 多种。正如前面所述，这些报刊并不是一味的阐发教义，相反，报道新闻、介绍西学和评论时事占据了它们的主要篇幅，从这层意义而言，媒介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中性”的作用，其本身是有着自己的性格的。

另外，虽然自清朝初始便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把自己孤立起来。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介绍世界情况的重要性。如王大海撰写的《海岛逸志》（详于荷兰和英国情况的介绍，字数在 5000 字左右），谢清高的《海录》（此书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详于介绍南洋诸国及荷兰和英国在这里的殖民活动，共 2 万字左右），李兆洛撰写的《海国纪闻》（该书对于《海录》一书详加考订，所述西洋各国情况更为详细），萧令裕撰写的《英吉利记》（书中围绕英国的方方面面展开记述，共 7000 余字），叶钟进撰写的《英吉利夷情记略》（除介绍英国外，还对美国的农业、物产和政教等情况有所涉及，约 4000 字），还有《英国略论》等著述（作者不详，约 2300 字）。由于战败的刺激，鸦片战争后的对世界的关注范围更加宽广，亦是中国知识界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著述，魏源编《海国图志》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以及梁廷丹的《合省图说》等大都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以王韬和黄遵宪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学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已经开始撰写外国史学著作，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就是根据自己游历欧洲后的著作，黄遵宪则于 1877 年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留日本达 4 年之久，利用这种经历，1887 年

他撰写成《日本国志》一书。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记》虽主要参考了《日本国志》一书,但也不失为一部编年体的日本变政专史。上述的著作都可视为近代媒介发挥介绍西学作用的清清源头。这些著述在介绍西方和西学知识方面曾起到一定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当然,媒介自明末清初起不仅仅充当了西学的“传声筒”,而且还有其性格的另一面,即成为保守派与西学交锋的工具。自“南京教案”以来,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遭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1637年,黄贞将他搜集到的闽浙人士拒斥西学的重要文献汇编成《破邪集》,对西学发起新的攻击。徐昌治更在两年后编刻成了《圣朝破邪集》,全面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论调的全面提出适应了当时一批士大夫阶层对外来文化既惧且试图排斥的心理状态,因为对于保持传统的精英阶层而言,天主教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气息正如“滔天之祸水”,是需要“起而呼号,六合之内,共放破邪之炬,以光明万世”的^①。为了达到讨伐的目的,以黄贞等为代表的人士四处奔走宣扬西学对传统儒学的巨大破坏作用,而这些传教士大都被视为“媚儒、窃儒而害儒”之妖孽。虽然论说的提出在当时的影响并未有多大的成效,但其给后继者却留下了可以沿用的一条足迹,形成了一种心理基奠。这种态度的短时段沉潜并不代表其永久的“沉默”,恰恰相反,由于出版等传播行为的效用,使得这种抗拒的心理在一定的空间里实际上还在蔓延和整合。以到了清朝初期,杨光先就发难西洋历法,造就了一场“钦天监教案”。而且以他为代表的这批士大夫在小范围的取胜更加助

① 黄贞:《破邪集自序》。《圣朝破邪集》卷3,第22页。

长了他们一贯以来对中西学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不仅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性格”,还充当了传统士大夫手中的一把斩向西学的利剑。

虽然传统上认为明清以来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思想上的松动,按常规推断媒介应该有了活动的空间。但笔者认为恰恰是自明末开始,中国的统治者在政治控制系统方面投注了更多的注意力,因此,较之以前的封建统治不是松动了而是更加具有约束力。但作为传递“福音”的西方传教士凭借自己坚韧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西学的阵地,媒介在这种“双重”环境下,具有两种身份就不难理解了。

· 现象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媒介的“自主期”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已名存实亡,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而避免其负面影响,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命题的本身其实并未排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而且所谓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现代——西方”之间建立的三维甚或多维的坐标下的一套话语体系。

如前所述,西方传统文化就其源头可以说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古希伯来的宗教文明密不可分。而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向自由主义迈进的过程中,宗教则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以笔者之见,基督教之所以能与西方现代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相伴而生,主要原因是基督教教义中所彰显的人性论,它肯定人性中的“神灵”(divine spark)和理性。由于有这一信念,基督教不仅肯定个人的尊严,而且也肯定人类所共有的一些价值理念。

儒家心目中的国家是一种道德秩序。而用于维持这种道德秩序的手段便是“礼”，用礼来教化民众，所以自孔子时便有“礼”失而求于野之说，国家成立以后，政府便担当了这权力兼教化示范的角色，但是，几千年的朝代更替并未冲淡“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甚至直至清代中叶在汉学风靡之时，“礼学”更是被提到了空前的地位。当然，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学的叙事话语、叙述方式等等中国的传统学术更遭到了冲击。事实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各种学科观念已经陆续传入国内学界并被彼时的先知先觉们知晓，例如《国粹学报》在1905年2月至11月相继发表了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该文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思想、流派及其演变的整个过程，行文中以“欧西”、“泰西”、“西人”、“希腊”、“伊大利”等国外众多学派学说进行中西比较对照，虽然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但《周末学术史序》所应用的学术方法使人耳目一新，文中分了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教育学史、法律学史等等方面，对各种学科观念的接受显而易见。

步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实际上面临着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即中国学术的现代化问题。学术的现代化不是沿袭中国传统学术的老路，也不是仿照西方学术已经走过的路径。而是在这之间另辟蹊径，这实际上就又回到了萦绕几代近代知识分子的老问题，即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汇问题。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成套行为模式，它的核心是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因此，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当到达一定程度时，便表现为两种异质价值观的对话与对叠。如前所述，价值系统位于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文化系统中最难变动的文化因子。中国文化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整合的文化系

统,而步入近代,中国面临全面而深刻的文化危机。随着这种情势的发展,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价值系统,也不得不面临着转换。“传统的价值观是经过累代选择考验而固定下来的,它有比较固定的形式。是以这种模式化的特征,才能起到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心理等等的作用。”^①因此,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的“对话”当是文化交流的肇始。

正是这种深层次交流的需要,使得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显得异彩纷呈,媒介在此期间就愈发显示出了自己的影响力和威力。就以当时学界的知识分子而言,都从不同方面与媒介发生着联系,笔者谨撷取期间的几位学人列表予以说明:

代表性学人与报刊杂志的联系一览

姓名	主办或编辑的报刊杂志	发表文章的报刊杂志	备注
李大钊	《神州学刊》、《民彝》、《新青年》、《少年中国》、《晨钟》、《每周评论》、《社会科学季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等	《新生活》、《甲寅》、《星期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国民杂志》、《言治》、《宪法公言》、《法言报》、《中华》、《太平洋》、《北京周报》等	一般而言,主编或编辑过的报刊,通常都有文章在上面发表

^① 耿云志:《论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 年第 5 期,第 10 页。

续表

姓名	主办或编辑的报刊杂志	发表文章的报刊杂志	备注
胡适	《竞业旬报》、《独立评论》、《新青年》、《国学季刊》、《努力周报》、《留美学生月报》、《北京大学月刊》、《读书杂志》、《现代评论》等	《大共和日报》、《科学》、《留美学生季刊》、《甲寅》、《东方杂志》、《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日刊》、《新潮》、《晨报副刊》、《教育杂志》、《新中国》、《新教育》、《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改进》、《国语月刊》、《申报·平民周刊》、《小说月报》、《新月》、《歌谣周刊》、《清华学报》、《吴淞月刊》、《北平图书馆月刊》、《学风》、《武大文哲季刊》、《现代学生》、《清华周刊》、北平《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国语周刊》、《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副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大学新闻》、《益世报·读书周刊》、《浙江图书馆馆刊》、《正风杂志》、《文学年报》、《中央日报·文史副刊》、《京报副刊》、《学生杂志》等	
陈独秀	《新青年》、《安徽俗话报》、《国民日日报》、《甲寅》、《每周评论》、《共产党》、《劳动界》、《向导》等	《民国日报》、《曙光》、《申报》、《东方杂志》等	
瞿秋白	《向导》、《新青年》、《前锋》、《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实话》、《红色中华》、《新社会》、《人道》等	《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中国工人》、《我们的生活》、《中央政治通讯》、《斗争》、《列宁生活》等	

续表

姓名	主办或编辑的报刊杂志	发表文章的报刊杂志	备注
鲁迅	《莽原》、《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奔流》、《新青年》、《文学》等	《晨报》、《京报》、《国民新报》、《申报》、《新闻报》、《萌芽》、《现代》等	
邹韬奋	《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教育与职业》、《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生活教育》、《妇女生活》、《新生周刊》、《生活日报》、《抵抗》(又名《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香港《大众生活》周刊等		因为邹韬奋和邵飘萍兼有记者、评论家和学者等几重身份,是以将两项统计合并为一项
邵飘萍	《申报》、《汉民日报》、《时报》、《时事新报》、《京报》等		

此种情况不在于专业性学术期刊参与的多少,恰是一些商业性很强的报刊的积极响应能引发我们一些沉思:一者是不管是学人抑或学界都对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媒介投去了亘古未有的注意,媒介反过来对学术又从未有过如此的关切,其间几次大的文化学术论战都少不了媒介的身影就是明证。再者,学界乃至社会对媒介的青睐使媒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媒介有了大有可为的空间,其本身受束缚的东西相对较少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一些报刊杂志敢于“直言”。即敢于秉持自己的一些理念,做出所谓“违规”的事情。如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就详细阐发了《大公报》的办报理念: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